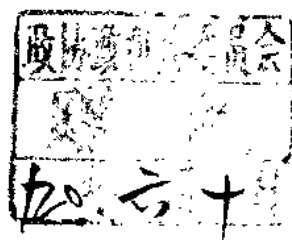


政和县文史资料

第六辑

44.1.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政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编

政和县文史资料

目 录

第六辑

1988年11月

民国期间史料专辑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和农民斗争纪略·····	甘 世(1)
民国时期政和金融业·····	林天福(10)
民国时期政和的水陆交通运输·····	刘建显 甘世 占树玉(15)
政和一中国期间兴替盛衰的几个侧面·····	黄志珣(21)
国民党、民社党在政和活动的始末·····	郑天鹤(25)
竞选国大代表的内幕及所见所闻·····	李式广(28)
民国期间民团的兴起、消亡、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甘 世(32)
会道门在政和的组织概况·····	郑天鹤(38)
民国期间政和妇女的地位及其婚姻制度·····	甘 世(42)
国民党政府压榨民众二三例·····	林天福(49)
抓丁摧残下的太平丘·····	李式广(52)
解放前政和卫生状况的回顾·····	高占春(56)
政和古邮驿和民国期间的邮政通信事业·····	李式广(58)
政和第一家工厂——高基碓水电厂简介·····	林天福(60)
民国时期政和保甲之概况·····	熊源泉(65)
我所知道的解放前夕政和县警察局状况·····	黎润洪(66)
四十年代末政和社会动荡情况的回忆·····	魏树陶(69)

考证资料一则

“化外之区”遂应场小考·····	田 富(73)
------------------	---------

人物补遗四则

革命老妈妈叶彩菊传略·····	叶相唐(82)
民主人士秦光前小传·····	甘少峰(85)
陈禄周先生传略·····	吴 更(88)
陈保真小传·····	陈兴良(90)

附 录

奇妙的鲤鱼溪·····	陈颖华(92)
锦屏村群众来信摘登·····	(94)

封面设计：李式广

封面书写：李式广

提供资料：县档案馆

印 刷：政和县印刷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和农民斗争纪略

甘 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阶级斗争尖锐、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虽然这段历史时间不长，但我国人民却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时期。饱受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与掠夺之苦。在这关系着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国各阶层各族人民迅速觉醒，工运、农运、学运波澜壮阔，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也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我们政和，地处边疆僻壤，尽管由于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等原因，没有发生重大影响的工运学运，但农民斗争却风起云涌，此落彼起。在闽北以至全省的农民运动中占一定的地位，也有较大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和县的农民运动基本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农民自发崛起，或在党的影响下兴起的。本文分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述：

（一）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农民运动：

一九二七年政和人民的优秀儿女杨则仕在建瓯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第二年就到家乡凤池村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一九二八年创建了中共凤池小组。一九二九年三月成立政和第一个红色农协会，同年七月间成立第一个中共政和支部。从此政和的农民运动在我党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革命方向蓬勃发展。干出一件又一件惊天动地的革命业绩，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一九三〇年秋季，红色农协会，在中共政和支部领导下，发动凤池、山溪等村庄的农民，采取统一行动，开展“登门退佃”斗争，迫使地主取消高租盘

剥，改订新约。揭开了向地主阶级开展斗争的序幕。

一九三一年八月，正值青黄不接，土豪勾结奸商囤粮居奇，漫天要价，贫苦农民无米下锅。红色农会一方面发动东平一带的农民开展破仓分粮斗争；另一方面又选出以杨则仕为首的农会代表团，在法庭上以铁的事实指控地主豪绅乘荒年之机勾结奸商囤粮外运，大发荒年横财的罪行。既粉碎了地主集团对农会的诬告与陷害，取得了合法斗争的胜利；又大长农民的志气，推动农运的蓬勃发展。

一九三二年的八月间，政和党支部从农会中选派积极分子王华兴等人，组成参观团前往闽北苏区崇安参观学习。从此我县的党组织和农民运动与闽北党委挂上了钩。一九三三年元月政和特支归属闽北分区委领导。在闽北分区委的正确领导与大力支持下，不仅农民协会组织在二十多个村庄迅速扩大，而且同时发展了红色青年队、儿童队，并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成立了一支十余人的武装队伍。在茶筒岭伏击龙安民团，揭开武装斗争序幕，向统治阶级打响了第一枪。

一九三四年八月间，中国工农红军七军团二十一师五十八团在团长黄立贵率领下挺进政和，与杨则仕同志会合。在当地党支部与农民协会的有力配合下，消灭了东平反动民团武装，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建立了建（瓯）松（溪）政（和）革命委员会。接着在太平隘粉碎了国民党刘和鼎五十六师三个营以及松、政、浦三县反动民团共一千余人的进犯，取得了歼敌七八十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近百支的重大胜利。九月下旬在凤池村召开建、松、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建、松、政苏维埃政府。民主选举张顺礼为主席，杨则仕为副主席，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自上而下成立土地委员会，土地革命在政和的东平、松溪的路桥、水吉的姜屯、浦城的豪村全面铺开。

一九三四年底，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建松政中心区委扩建为建松政县委，建松政革命运动进入鼎盛时期。不久红军主力转移，国民党当局纠集刘和鼎五十六师和各县反动民团分三路乘虚进犯。建松政由于敌我

力量悬殊，战斗失利，苏区逐渐丧失，转入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共党员我县优秀的儿女杨则仕在崇安一次战斗中被捕牺牲，政和的革命形势及其农民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一九三五年三月，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率部回建松政，并随带工作团开展恢复苏区工作。五月，重建建松政中心县委，洪坤元任书记，重新点燃建松政革命烈火。一九三六年二月，为沟通闽东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黄立贵率部挺进屏南，转入政和，于洞宫的禾坪村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胜利会师。四月，闽北党与红军领导人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和闽东党与红军领导人叶飞在洞宫的仰头村召开著名的“洞官山联席会议”，对推动建松政三年游击战争顺利开展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四月十二日建松政中心县委在西表召开扩大干部会，对党的地方组织作了调整，陈贵芳同志任东平区的书记。从此，他率领建松政的农民优秀儿女，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长达十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的革命形势由国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转入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抗日，我建松政中心县委派陈贵芳同志在东平区公所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立即释放政治犯，停止捕杀革命群众”等要求。国民党被迫接受。我建松政游击队也改为“闽浙赣边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队”。为顾全大局，我方停止打土豪和伪乡镇公所，并负责动员根据地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共同抗日。

一九三八年，我闽浙赣边抗日义勇军分两批共五百七十人应调前往江西铅山县石扩镇，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队”，在这支北上抗日的队伍中，我建松政农民组织输送健儿三百七十人奔赴抗日前线。

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这是全国人民的呼声与要求，但国民党内一部分反动派却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地与我方制边磨擦。就在我主力北上抗日不久，他们即出兵摧残政屏边苏区，唆使刀会头子林乃滔袭击驻扎在新康村的寿政庆边中心县委。这一事件使我寿政庆中心县委书记范振辉、政屏县委书记张家镇等三十多位同志壮烈牺牲。一九三九年二月，反动派又向我政

屏边中心县委机关进攻，杀害张发达等同志，政屏游击区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发生惊震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流窜在闽浙赣边境之残余奸匪全面清剿”先后对建松政游击区发动了三次军事围攻，尤其是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手段最残忍的第三次军事围攻，钱东亮任闽北绥靖指挥，派参谋长柴毅坐镇东平，采取“七分军事，三分政治”、“计口授粮授盐”、“大村守，小村并”、“烧山、授山”以及“抢光、烧光、杀光”等一系列恶毒的政策。同时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个老百姓，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的反动口号。並颁布了三十九条格杀令。在东平一带，足足围剿了一年多时间。烧毁村庄一百多个，杀害无辜一千余人，我县农民为革命付出重大的牺牲和血的代价。

尽管如此，具有顽强不屈斗争传统的我县农民，不仅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而且在党的领导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开展反磨擦斗争，不断的打击敌人。一九三九年八月中秋夜，陈贵芳同志率十余名壮丁队，在东平镇陈班长的内应下奇袭东平镇公所，缴枪十二支，连夜又袭击护田乡公所。一九四一年五月，陈贵芳同志任建松政特委代理书记。率部攻打水吉外屯乡公所，缴获长短枪二十六支。在浦城马坑，击溃敌人一个中队，缴枪九支。左丰美同志率部在稠岭击溃敌人一个连。一九四二年为接应赤石暴动的同志，陈贵芳率部打建瓯墩阳，再击政和县城。左丰美同志率部在龙浦公路伏击敌银行经理望炳礼小汽车。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我建松政游击队在松溪攻打郑墩，缴枪十三支，在龙浦公路上伏击打死国民党二十五集团军参谋长陈达，以及在西溪消灭敌人一个分队，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之后，又采取声东击西，分别出击的方式，用一年的时间，粉碎了柴毅坐镇东平督战的第三次军事围攻。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疯狂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妄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中国革命进入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建松政地区曾发动过大小规模不等的几次军事围剿，建松政人民在闽浙边地委的领导下，为巩固游击区发动了爱国游击战争。

在龙浦公路劫汽车，缴获一批军事物资。在寨岭伏击松溪伪县长带领押送的大批军需品，在松溪连续奇袭渭田、周墩、源尾等地。在政和袭击外屯、胡屯，在建瓯攻打后山街，在浙江边界，连续攻打庆元的竹口、江根，龙泉的小梅、曹岭、李山头，景宁县的沙湾镇。同时在政和的长际、九蓬、宝岩、黄岭坑一带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农会，贫农团以及民兵组织，开展抗丁、抗粮、抗捐税的“三抗”斗争和反霸斗争，连续袭击了筠竹坑、林屯以及寿宁平溪等反动据点，并扫清政和与建瓯外围的残敌，配合解放军二野解放了松溪、政和以及水吉、浦城等县，迎来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我县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气势磅礴，而且旗帜鲜明，方向正确，发展非常迅速健康。可以说我县农民为革命为抗日救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在长达三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争得了红旗不倒的光荣称号。其丰功伟绩，党史有详细记载，这里仅举其要者。

（二）自发崛起，以及我党影响下掀起的农民斗争：

我们政和的农民具有顽强不屈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唐乾符年间，我县的农民就配合农民起义军黄巢部队，四次歼灭官府军，连续斩杀御史中丞李彦坚、御史杨惠明，以及解粮官蔡伯元，福建招讨使张谨等朝廷派遣的将领。宋末元初政和农民又爆发了以黄华为首的反元大起义，他们聚众十万，时间长达三至四年，连营五十余座，致福建之地，十去三四，使元朝贵族惊慌失措。明永乐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政和黄君亮与丽水周叔光联合起义。明正統年间，我县锦屏又爆发以叶宗留为首的矿工大起义，这支工人起义军在三年中转战闽浙赣三省十几个州县，与沙县邓茂七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相互呼应，威震明王朝。一百余年后，倭寇侵犯我国沿海，政和又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抗倭斗争。全县军民坚守四十余天，虽因援兵不至而惨遭屠杀一空的浩劫，但我县人民忠义爱国的浩然正气，千古流传。清咸丰年间，太平军石达开部南下。在我县农民的配合与支持下，两进政和，并于政和境内转战六个多月，在大小几十次战斗中阵斩官兵联兵千余人。

正因为政和人民具有如此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传统，因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上述我党直接领导的农民运动之外，在我县境内还曾发生大小二十余起自发或在我党影响下的农民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如下六次：

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二年的农民参军热潮与陈家轍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二年秋，国民革命军东路讨逆军第十路军司令欧阳豪路经政和，並在政和插旗招兵。我县除应召参军一百余人之外。坂头乡农民陈家轍领枪十支，组成待命听调北伐预备军。后因失去联系沦为土匪。陈家轍也因内部火并而被杀。第二年其二弟陈家轍接手组建农民自卫武装。这支农民武装以洞宫为根据地，打着“劫富济贫，保境安民”旗号经过五年时间的辗转发展，最盛期，不仅发展到三百余人枪，而且自办修枪厂，自修自造武器。这支农民自卫军，一不投靠国民党，替反动派为虎作伥。二不打家劫舍、蹂躏乡里。三不攻击共产党，而且同情支持革命。这支农民自卫武装自组建及至首领陈家轍被害的十几年时间中，共做了五件大事：（一）清剿了流窜于政屏交界的零星散匪，摧毁大股顽匪陈明亮匪部，使杨源、洞宫一带的农民不受土匪的骚扰。（二）多次击退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石门团汤德崇部的进犯，使周围群众免受这些民团的蹂躏。（三）一九三三年率部攻打政和县城，烧县衙、砸牢狱、释放犯人。（四）击退国民党五十六师刘和鼎部队与石门团的联合进犯。（五）与红军、游击队有过合作关系。除平时积极支持闽东游击队开展革命活动以外，一九三六年闽北独立师与闽东独立师在洞宫会师期间，这支农民自卫武装不仅提供了地盘，而且起了一定程度的掩护作用。对这次闽东北党委联席会议的召开有一定的贡献。

第二次影响较大的农民斗争是一九二五年的奖山起义与西里农民攻打政和县城事件。这一年的初春，政和与水吉一带的边区农民，处于重租重税而又青黄不接的饥饿之中，为抗丁粮、抗重租苛捐，起义者聚集奖山，而后攻入东常市（今东平镇）杀掉贪官污吏多名。与此前后西里（即今镇前杨源一带）农民数百人攻进政和县城，烧掉当时反动政权的衙门，放掉监牢里的犯人，同时破全济民。这两次农民斗争声势很大，影响也很深远，可惜缺乏确凿而又详细的

文字记载资料，为首者何人？规模多大？详情如何？均无法说清，仅从民间流传中知其蛛丝马迹。

第三次影响较大的农民斗争是宝岩农联所开展的三抗斗争。

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借“抗日”之名大肆抓丁、派款、征税。仅税收一项就有人头税、壮丁税、民团伙食费、团丁费、婚丧费、义购枪支费等二十多种。加上反动地主阶级的重租与高利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县宝岩一带的农民在党的影响下，通过多次串连组成以薛遇祖为首的宝岩农联。这个农民组织从连山、坑里、山后等村开始，发展到前村、角坂、际头、富垅等十几个村庄；其骨干力量约三四百人，最盛时期拥有会员一千余人。他们抱成一团，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丁、抗税、抗捐”斗争。这场斗争曾组织千人规模的大游行，也曾聚集三四百人攻打澄源村，火烧乡公所，还在坑里和连山等地抗击了韦淡明、张文成两个县长亲自带队的三次大围剿，先后坚持了二年半时间，后因寡不敌众又未取得我党的联系与支持而被摧垮。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为我党后来在宝岩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游击区，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第四次影响较大的农民斗争是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一九四〇年夏季的角坂“刀子会”抗丁反暴斗争。角坂村的刀子会，实际上是“宝岩农联”的一支骨干队伍，人数约七八十人，其成员全部是农民。他们的斗争目标同样是抗丁、抗捐、抗税。不同的是他们是通过封建迷信手段向会员灌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而维系人心的。一九四〇年政和国民党当局大举抓丁抓伕，而且是采取当农民下田生产时，突然袭击的毒辣手段。角坂一带的农民被抓去三十多人，并计划于第三天押解县城。此事被角坂刀子会探知后，他们在“有难同当解救同胞手足”的口号激发下，组织会员在稠岭进行暴力劫夺。追赶不及，又追至外屯，不仅把壮丁全部劫夺回来，还打死保安队3人，缴获步枪两支。此举对反动当局惊震很大，县长张文成亲率两连兵力，准备血洗角坂村。岂知角坂村的刀子会，不仅斗志顽强，而且英勇善战，他们以土銃、长矛，与之对

抗了一天一夜。其结果，保安队被打死二十多人，打伤三十多人，还被刀子会缴去一挺机枪、一支步枪、一千多发子弹。县长张文成被打飞了礼帽，吓得屁滚尿流，率领残兵败将，仓惶遁回县城。尽管张文成第二次采取偷袭的办法，打进角坂村，以后又指派乡绅出面以缴枪还人为条件调解了事的办法把这次抗丁反暴斗争镇压下去。但角坂刀子会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鼓舞了人们的反抗斗志，又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得反动当局，此后不敢轻易在高山区抓丁抓伕。

第五次影响较大的农民斗争是一九四〇年的新坑农民抗丁斗争。一九四〇年春季，新坑村的农民刀子会首领张义顺，在建松政游击队负责人杨荣堂、林宜昌、叶风顺等同志的启发下，提高了阶级觉悟，沿着正确的革命方向开展活动。同年九月间，张义顺侦悉寿宁县长杨绍义携带大量浮财，同时率保安兵押解一批壮丁，经过新坑口的暖溪去沙县就职。经过周密策划，他们组织了十八名精壮强悍，武功娴熟的会员埋伏在暖溪隘口。由于布置周密，会员们作战机智勇敢，这场伏击战，不仅解救了一百多名壮丁，而且消灭保安队兵三、四十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六支、短枪三支。这次农民武装抗丁斗争，惊震了反动政府，寿宁县派出保安队兵一百余人，扬言要踏平新坑口。由于这场斗争是在我党直接影响下发动起来，因而在我党派出武装力量直接接应下，不仅粉碎了反动派的围剿，保卫了新坑人民的安全，而且经过巧妙的战略转移，最后与我建、松、政游击队汇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六次影响较大的农民斗争，是一九四五年东路农民聚众拥进县衙告状，开展合法斗争。铁山区的伪区长魏子海，在外屯一带为非作歹。强征巧夺，敲诈勒索，鱼肉乡民。激起东路一带农民的愤怒，自发聚众三四百人，拥进县城沿街高呼：“打倒魏子海，惩办土豪劣绅”的口号，最后拥入县衙向县长面呈诉状，要求县长当场处理。当时的县长被众多农民的愤怒和呼声吓得汗流夹背，不得不答应撤职查办魏子海，向农民打恭作揖。尽管善良的农民在县长的口头许诺下，很快地一哄而散，但这场斗争对我县却有一定影响。

（三）政和农民斗争的历史意义。

纵观以上所述，不仅可以看出政和农民斗争的概貌，而且透过政和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所发生的各次农民斗争，可以看出党领导下的农民斗争是我县农民各次斗争的主流，政和的农民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很大，它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起了革命主力军的作用。上述历史事实表明，从一九二二年农民踊跃参加革命军开始，直至全国大解放，政和境内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所发生的历次农民斗争，无一不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顽强不屈的革命斗争性。他们的斗争矛头始终集中指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反动的统治集团。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斗争目标也集中在反压迫、反剥削、反侵略、反对抓丁、抓伕苛捐杂税等方面。革命性是十分鲜明的。另一方面，政和地处偏僻山区，商业不发达，也没有产业工人。以我县为中心的建松政苏维埃政权，及其各种群团组织，包括游击队武装，其主要成员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农民。建松政地区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事实上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在建松政地区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和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事实上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斗争与农民斗争的胜利。因而我县农民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占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所起的作用是主力军的作用。他们所作的贡献，不仅是在我建松政地区，从根本上打击並最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与统治，争得了红旗不倒（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的光荣称誉，而且为北伐、为抗日、为全国解放事业输送了上千名的优秀儿女，作出了成千人流血，一百余个村庄毁为平地的巨大牺牲，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



民国时期政和金融业

林天福

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政和县的金融业有所发展，设立了银行机构。但是，它的规模十分小，对全县经济生活的影响无足轻重。就整个金融业来说，它仍然保留着原始状态。笔者根据县志办、县金融志编写组提供的资料，和走访魏树陶、范汝梅、郑亚雄等老同志采集到的有关资料，整理成以下文字，为我县编史修志工作提供一点线索。

一

民国初期，政和县城存在过典当业。典当，亦称当铺，是一种专营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清咸丰和同治年间，金国典当业盛极一时。入当的物品主要有：金银首饰、珠宝、布匹衣物，甚至农具工具，等等。当价一般为七折，也有对折或四、六折。成交后开给收据，称为“当票”。期满赎回原物，付给利息，一般为月息一分至一分五厘，按月计息。到期如无力赎回，应事前办理转期手续，但必须付清利息。再无力赎回，其典押品就被无条件没收转卖，为当铺所得，转卖价格比当进高一成左右。人民群众对典当业抵押贷款的苛刻办法非常不满，国民革命之初，当铺就成了当时打击的对象之一，使典当业走向衰亡。

当时，政和县城只有一家当铺，名叫“九金当”，地址在现在的星溪保健院那条巷子里，当时名叫“主簿巷”，又叫“猪屎巷”。这个当铺的创办人是李荣东，但创办年代、当铺规模、业务大小等情况，如今已无从考查。据魏树陶老人回忆，它在民国十年（1921年）以前就停业了。在他能懂事的少年时代，就只能在当铺正面的墙上看到“九金当”几个字了。

民国时期，政和县民间资金融通的主要形式是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利息一般为加一利，即年利百分十，有的也要加一点五。浙江来的香菰客，来时都不带钱，靠向本地借贷开展香菰生产，这种借贷利息最高，可达加二或加三利。借贷要打条子，有的要担保人，有的要以实物作抵押，抵押主要是金银首饰。抗战以后，高利贷十分利害，借一百要还两百，而且按天算期限，最长的两个月叫六十毛天，也有五十毛天，四十毛天，是短的到二十毛天也就要加倍偿还。特别是1948年到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快倒台时尤甚。

二

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大正九年（1920年）出版发行的《支那省别全志》福建省第十四卷记载：“政和无何金融机关，仅有小规模的钱店，一般商店兼及小银币、铜元及制钱的兑换”。《支那省别全志》这本书是日本学生于1916年前后到中国考察后编写的，其记述不一定准确，但从中也可以知道我县民国初期金融业的一些情况。

所谓钱店，又叫钱庄，产生于晚清时期，是旧式金融机构，经营存款、放款和兑换银两、银元、钱币等业务，以获取利息和手续费为生。据老人们回忆，当时政和县没有专营钱庄的，钱庄的业务各商行均有兼理，甚至异地汇兑也可以通过两个有关的商行来办理。当时，许多到建瓯读书的学生，其费用往往通过政和与建瓯有关系的商行汇兑，避免路途携带现金的不便。

陈箕用是当时政和资本最雄厚的商人之一，与建瓯人在福州开办的茂丰商行有大量的业务往来，政和与福州两地之间的木材、茶叶生意，都可以通过这两家商行结算汇兑。福州茂丰商行每年两次用木船运银元，由省保安队护送到政和，一次在春茶采款时节，一次在年底前。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以前，福建省银行在政和的办事机构尚未设立，政府所收的税款上交，也交由陈箕用的商行汇往福州。

当时，政和商人要到外地进货，外地商人要到政和采购，除了通过有关商

行办理交易款项结算外，就得带上现金（银元或钞票）。在钞票未通行之前，因银元笨重，要雇人挑，还要雇保镖护送。抗战前，越南茶商陈护记与政和范昌义做茶叶生意，每年达两三万箱（每箱四十斤），其货款就是用木船，由省保安队护送，一船一船地把银元从福州运到政和的。

三

1936年以后，政和才有现代金融机构。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创办福建省银行，推行金库制度，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在政和县设立金库，负责办理公款收支与保管业务。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政和金库政为政和分理处。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月，政和分理处政为政和办事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三月，政和解放前夕，省银行将政和办事处撤回福州。

福建省银行在政和的办事机构规模很小。开始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最多时也只有主任、会计员、出纳员、练习生、服务生等五名工作人员。其业务范围有多大？因撤回福州时账簿失落，现已无从查考。据老人回忆，当时参加储蓄的人极少。旧社会有银的人不多。一些富有人家，有的把钱拿未经商、放债，有的拿未添置家产，有的甚至换成金银埋在地下，以备长久使用。银行里存放的多为公款，因政和县经济贫困，为数不多。有的银行也发放少量贷款，能拿到的也只有少数与银行有关系的人。可见，他们的主要业务是管理官方款项。

福建省银行政和办事机构建立后，先后发生了以下几件事：

1、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金库员董翼鸿挪用库款7998.39元潜逃。同年十一月省行派李颂芳、陈勉之到政和审查此案。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省行要董翼鸿的保证人执事刘尔纷代偿无果，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以“什项支出”科目支付。

2、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省行对政和分理处人员进行一次考核。其评语为“从各方面情形观察，似颇能胜任称职，外间与论尚佳，存放款亦均努力承揽业务，会计各门措置并觉相当。惜于事物方面，公私稍有混淆，私人生活略欠严肃，偶有聚赌情事”。

3、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闽北战事紧张，政和办事处也同闽北各县办事处一起，由水路撤退，撤往周墩或屏南”。

4、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和中山路卢厝坑大火，政和办事处离这里只有三十多家，因火烧到富家，墙高而熄，没有烧到办事处，省行因之发文嘉勉。

5、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六月，商民代表范基周控告政和办事处经理魏芳“经营商业，高贷放款，延压电汇”。八月，又控告魏芳“侵公间接图利”。状告到当时的省政府，省府再三催函，总行调查认为“控告与事实不尽相符”，把魏芳调离政和。

民国时期，政和县除了福建省银行设立的办事机构外，就别无分店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公布《县银行法》。当时，福建省银行提出了《筹建县银行意见》，第一批计划在1941年内创办14个县银行，其中包括政和县。但事实上一直没有创立，其他一些全国性银行在政和也没有分支机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初，当时的县长吴玉树才把筹建县银行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于当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的县政座谈会上通过决议。决议说：“筹设县银行一案：一、推赵博、杨怀恩、宋开宗、李联升等为常务筹备委员负责办理。二、县银行资金暂定银元二万元。内公股八千元，商股一万二千元（乡镇四千元含内），分期筹足”。这个决议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倒台而流产了。

四

在货币流通方面，民国初，《支那省别全志》的记载是：“在流通中的银

元仅有日本银元一种。小银币有福建铸及民国纪念币。后两者的二角价较前者约低铜元二、三枚。福建官局的最受欢迎。制钱八文可换到铜元一枚。前清的大钱最有信用。近郊各地称一个铜元为一片。纸币不通用”。这个记述显然有不实之处，如“银元仅有日本银元一种”。据有关资料和老人们的回忆，当时在政和市面上流通的银元有：总理（孙中山版），袁大头（袁世凯版），龙洋（大清版），鹰洋（墨西哥），日洋（日本），英洋（英国）等。

纸币在政和流通是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以后。在这之前，纸币尚未取信于民，市面上很少流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宣布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通过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强制使用，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以法币一元兑换银元一元的比价，强行收购银元。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省银行在政和设立办事机构，发行了一元主币和五角、二角、一角及五分、二分、一分的辅币，在市面上与法币并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又流通金圆券。当时，发行的各种纸币均无金、银本位保证，发行又无限额，大量投放市场后，造成纸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特别是民国后期，纸币实际上成了废纸。老人回忆说，当时一篓筐纸币买不到一根油条。民间大量的财富流进了国民党官僚和奸商的腰包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前后，政和县城的一些商行店铺，曾自己发行票子在本地流通。其面额均为一角、二角、五角。老人回忆说，发票子的店铺很多，大的如昌义生、美珍、隆盛、延寿堂等商号，小的到一些小吃店。后来，政府禁止店铺私发钞票，要他们全部收回。一些票子发行量大的中、小商店趁机宣布倒闭，不收回自己发出金的票子，从中大捞一把。

